

面积也许是相当大的。

马尔萨斯认为，有上述情况的国家不能实行限制粮食进口政策。但除此之外就要另当别论了。他针对某种说法毫不留情地评论道：

有人建议（当然只是一种戏言而不是认真的），欧洲应该在美洲种植它的谷物，并且作为一种最好的世界分工方法，它应该用它的全力专门从事于工商二业。但是即使在这种痴心梦想的假定之下，以为事物的必然过程一定会在短期内达到这样一种分工，而且欧洲或者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养活更多于它的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其结果也一定是很可怕的。^①

马尔萨斯还指名道姓地抨击了主张谷物自由贸易的说法：

有人就一再重复说——显然是毫无一点事实作为根据的——谷物的自由贸易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不会受到饥荒。《英国百科全书》附编里《谷物法令》一文的作者甚至这样说：“常常会有这样的事，一个国家歉收的时候，其他某些地方都会遇到丰收……全世界的粮食总是很充裕的。只要我们抛弃了我们的禁令和限制并且不再与上苍的智慧对抗，那就保你可以常常得到丰足的粮食。”同样的文字一再见之于上述的论文中……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话与最广博的实际经验一定是相矛盾的。^②

马尔萨斯宣称：

这是一种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每一个领土国家，在它向富裕进展的自然过程中，应该为自己生产工业品……但是当美国依照这条原则开始对欧洲停止谷物的供应，而且欧洲在农业方面的努力又不能充分补给所缺的粮食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感到，这种在财富和人口方面较大的暂时利益是用长期的退步和贫困这种高昂的代价换来的。^③

马尔萨斯引用亚当·斯密的话以加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亚当·斯密说：“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通过工业和商业得来的资本，在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土地耕

^①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11~413页。

^②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24页。

^③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13~414页。

耘和改进中保存和实现以前，都是一种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所有物。”^① 在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国家里，对外粮进口的限制，不但会把从商业和工业中得来的利益，不管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散布在土地上，并且因此而（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保持和实现它；而且还能防止农业和商业改进中常常带来灾害的那些动荡。^②

但是，在市场经济在全球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大趋势下，马尔萨斯的理论在很长时期内被抛弃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在拥护自由贸易和反对加诸生产的限制的论证中“读者可以欣赏到这样一幅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图画：它只表现了工业的胜利向前推进，除了局部性的失调和限制性的政府政策以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工业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持续发展”^③。

直至今天，在全球陷入环境和资源的严重困境中，以致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时，部分清醒的学者才重新认识马尔萨斯理论的重大价值。

罗伯特·艾尔斯^④指出：

当我们到了 20 世纪末的时候，人类比两个世纪前马尔萨斯写作的时候要多得多，而且更富有（平均水平）。特别是那些率先工业化的国家现在已相对富裕。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人工资本（基础设施、机器、知识）的大量积累已经发生，土地不再是国内财富的主要源泉，今天的马尔萨斯受到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技术乐观主义者放肆的嘲笑，他们误以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奇迹般的繁衍能力。

然而，一些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特征是，富裕是通过对自然资本禀赋的开采和耗竭而实现的，这不仅指的是化石燃料，还包括森林、渔业、良田和矿产。对于像石化燃料这样的某些资源，技术是最终能够提供替代物……但自然赋予的其他一些资源，特别是表层土、清洁水、新鲜空气、宜人气候和生物圈及其许多重要功能不是这类技术可以替代的。

如果今天马尔萨斯还活着的话，毫无疑问，他会按照最近的发展和信息来修改他最初的理论。他必然会认识到这样的人口特征：由于生育

^①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 420 页。

^②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 421 页。

^③ [美]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 379 页。

^④ 罗伯特·艾尔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最著名和富有创见的批评者之一。

率的逐渐下降，欧洲人口增长实质上已经停止，而全球人口增长也正在减慢。但是他识别出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只是表象有了变化。新马尔萨斯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由于其今天的功能决定，倾向于增长至它的维持生存的极限。经济增长倾向于指数形式（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极度指数方式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加速的）。另一方面，尽管自然资源基础存在替代的可能性，但是它仍然是有限的。尽管技术进步使自然资源的发现、开采、处理和利用的效率得以提高，但从长期看，资源可获得性的增长速度不可能是指数形式的。因此，经济指标指数增长与支持它的可获得自然资源之间是不匹配的。^①

之后，在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更进一步将“非市场经济现象”排除于研究视角以外。

（三）新古典经济学

然而，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增长和发展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或者说没有科学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取代古典经济学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进一步深入细化研究“市场经济”的学问。在所谓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分析问题的概念、分析工具和问题本身都向细微化、抽象化、逻辑推理方面大幅推进。例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市场”的研究细化到对“消费”和“需求欲望”等方面的理论层次，用“价格”和“边际价格”统一理解和分析供求关系、报酬递增与递减等。^②这种研究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大前提，即不能用价格衡量的经济现象是被排除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绝对稀缺资源状况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者完全不能以价格衡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都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是说，有两大领域问题被排除在外，一是

^① [美]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213~214页。

^② 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马歇尔的研究可参考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三、四篇，商务印书馆，1964。

绝对短缺状况的经济发展问题，即不能用市场机制解决的经济问题，例如，在某一无对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其基本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中，如果和自然直接相关的土地因缺乏水而不能使用，又不能代替之，其经济如何发展？又如战争时期极端的食品匮乏只能用计划分配。二是在经济进行中如何处理自然界无偿加入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计算，以及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废弃物向自然界“无价”排泄。

新古典经济学在漠视上述领域的同时，也将自然环境和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问题进一步“遗忘”在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外。加之19世纪末以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以前，古典作家的一些论断更被认为已经过时。马歇尔认为，“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机的巨大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三个推论中后两个已经过时。^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态平衡和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晚近的经济理论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论点提出了重要质疑。

赫尔曼·E. 戴利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说：

不像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今天的标准（新古典）经济理论是从非物质的参数（技术、偏好、收入分配都被看作是给定的）开始的，要求所生产的物品和所使用的资源数量的物质变量必须调整以适合由非物质参数决定的均衡（或均衡的增长率）。非物质的定性条件是给定的，物质的定量规模必须调节。

新古典经济学连同它的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使得人们的注意力离开了资源和劳动而转向效用、交换和效率。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革命连同它的有关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对于理解价格和市场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收益是以太快地把物质因素放入背景为代价而获得的。^②

夏明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虽然对经济增长的原因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予以了充分注意，但毕竟还是将技术变革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主要还是从单纯的经济活动本身以及技术运

^①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第199页。

^② [美] 赫尔曼·E. 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5~6页。

用的角度出发的。^①他还指出，从表面看，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忽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甚至把资源稀缺性假设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前提，并认为经济理论的目标和任务就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然而他们所指的稀缺的内涵只是一种“相对稀缺”，是一种甲资源相对于乙资源的稀缺，关注的是在“一种物品生产较多就会导致另一种物品生产较少”这种相对稀缺的世界里社会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抉择问题，与生态学意义上的资源的绝对稀缺相去甚远。^②

戴利质疑：

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都完全懂得经济增长要从环境中提取原材料，并向环境排放废物。那么为什么这个众人皆知的事实会在循环流程的范式中被忽视呢？经济学家只是对稀缺性感兴趣。不稀缺的事物被省去。相对于经济需求，环境的资源供给和接收废物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在经济理论形成的年代里，这或多或少是一个事实。^③

夏明方也指出，这种过度简单的新古典模型或类似的理论模式之所以超脱于人类生态系统之外，就在于它们完全根植于近代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中，即人类可以无限度地征服大自然而大自然只能被动地响应。^④

是否可以有些极端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在不考虑自然界提供的经济发展物质（这类物质只能是大自然给予的而不是人类用各种手段能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例如，阳光、土壤、水、空气、石油和各种矿藏、森林资源等，又如特定的自然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绝对稀缺条件下（即不能用人类的生产活动取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像古典物理学一样是和一个特例相关的，即假设我们远离极限……在经济学上是远离地球承载能力的生物物理限制和已“饱和”的社会伦理的限制。因此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古典

^① 夏明方：《近代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村市场——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一个修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第153页。

^② 夏明方：《近代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村市场——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一个修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第153页。

^③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47页。

^④ 夏明方：《近代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村市场——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一个修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第154页。

理论在接近极限的地帶无法很好地起作用。^①

四 “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影响做出全面评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该流派注意到外在自然环境、历史基础对众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影响，并强调了现存国际贸易一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因素。

关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问题，早已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有了大量高质量的成果。即便对这些成果进行简单介绍，也绝非几部专著就可完成，这已是一个日益丰富和深入的专门研究领域。我国著名学者吴大琨在1980年代初就曾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经济学界讨论得最多、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有关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西方当前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是“传统派”经济学家，也就是说，都是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存在过的问题，两者之间的不同只是现代化的时间先后而已。所以，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在经济上模仿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西方标准积极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和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地“发达”起来的。但是，这一理论近年来已受到愈来愈多地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们的抨击。按照这一派学者们的意見，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和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相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富起来，发达起来，是和长期以来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剥削而不断贫困化分不开的。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以后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时，绝不能忽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并不相同这一客观事实，而只单纯地追求“国民生产总

^①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52页。

值”的提高。因为，二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西方标准的“国民生产总值”即使有提高，只要这一国家占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贫民生活非但不能提高反而还要下降的话，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只能称作是“不发达”的发展。这种“不发达”的发展愈发展，就愈会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强大而绝不是相反。对于这一“不发达”问题的提出，我认为是战后西方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与进步。^①

限于笔者个人学力和篇幅，以下仅以举例方式进行挂一漏万的简介。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从十五世纪起，欧洲的扩张就已经对世界其余地方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最近五个世纪中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主要是欧洲国家扩张后果的历史。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欧洲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的自动作用首先造成了不发达，然后又阻挠摆脱不发达的行动。总之，不发达是历史过程的产物。^②

当一个有等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正在崩溃或者被另一个体系所代替时，贫困的文化就往往发展起来……它往往是帝国主义的征服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下，本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被摧毁，本地居民处于被奴役的殖民地地位，有时，这种殖民地地位会延续许多世代。^③“我们相信，不发达国家，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是历史力量的产物，特别是由于欧洲的扩张和它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产生的力量的产物。因此它们是比较晚近的现象。并不是欧洲‘发现’了不发达国家”；相反，正是欧洲制造了不发达国家。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同欧洲接触的那些社会曾经是高级的、有文化的和富裕的。^④

1944年1月罗斯福总统在同哈利法克斯勋爵谈话时曾评论说，法国拥有印度支那“将近一百年，而印度支那人民的状况却比开始时更糟

^①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中译本前言。

^②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0页。

^③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4页。

^④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4页。

了”。这个评语适用于整个亚洲。^①

直到 17 世纪初叶，印度在经济方面仍比欧洲先进。它拥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制造业部门，主要生产包括金银物品大部分奢侈品，加上玻璃器皿、纸制品、铁制品和船舶。其中很多项目以及棉布、丝绸、靛蓝和硝石都是输往西方换取黄金的。印度工业的衰落是由于下列几种因素：欧洲由于工业革命而出现的技术进步，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地位，以及英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强加给印度的自由贸易理论。1833 年以后，非工业化的过程加速，强调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农业。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时，工业已全面衰落。^②

在 18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整个 19 世纪期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伴随它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为生产率和物质福利水平的持续和重大提高打下了基础……但这种物质（和文化）的进步不仅在时间上不均匀，而且在空间上也分布得极不平衡。这种进步局限于西方世界……

如果说资本主义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区全体居民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它却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它有效地破坏了落后国家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它用市场契约代替了世世代代保留下来的那种宗法关系，它把农业国家的那种部分自给自足或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引向市场商品生产的方向。它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③

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合理性全面替代僵化的封建或半封建奴役状态，尽管经历了种种痛苦的转化，总是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步骤。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发达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本国领主的长期剥削却不受封建转变过程中日益减弱的约束。地主分子的古老压迫加上这种商业压迫造成

^① [美] 查尔斯·K. 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 115 页。

^② [美] 查尔斯·K. 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 116 页。

^③ [美] 查尔斯·K. 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 128~129 页。

了双重的剥削、变本加厉的腐败和更加明目张胆的不公正。^①

过去一百年间在落后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些工商业都已迅速地纳入了垄断集团——寡头统治者的富豪伙伴——的控制之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而且有效地堵塞了经济增长的一切可能性。^②

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同统治阶级中所有其他阶层结成联盟的时候，它就从一个个战略阵地上后退了。中等阶层生怕它同地主阶级的争吵会被激进的人民运动所利用，于是就放弃了它在土地问题上采取的一切进步态度。中等阶层生怕它同教会和军方的冲突会削弱政府的政治权威，于是就离开了一切自由派与和平主义的潮流。本国资产阶级生怕敌视外国利益集团会使他们在发生革命的紧急情况时失去外国的支持，于是就抛弃了过去反帝和民族主义的纲领。^③

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出现于一系列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则仍然处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的原始历史阶段。然而甚至稍有一点儿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发达状况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传统的，而不发达国家的过去或现在同发达国家的过去也无任何重大类似之处……历史研究表明，当代的不发达状态大部分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而且，这些关系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结构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一种主要是错误的有关观点认为，这些不发达和它们国内大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必须依靠国际和本国的资本主义中心向它们扩散资本、机构和价值观等来加以促进或给以刺激。以不发达国家过去经验为根据的历史观说明，恰恰相反，不发达国家只有在目前摆脱了大部分的这种扩散关系以后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④

^①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29页。

^②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1页。

^③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3页。

^④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46页。

作为世界银行官员的一位专家在 1970 年代曾指出：

富国和穷国之间极其不平等的关系，正在很快成为当代的中心议题。他认为，不平等关系的原因，应该归结到对第三世界相当不利的国际结构和机制上来，从而要求对这种结构和机制加以彻底的体制改革。其论据如下。（1）在国际储备的分配方面今天是非常不平衡的。1970 年到 1974 年期间，占世界人口 70% 的穷国在 1310 亿美元的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不到 4%，这只是因为富国通过它们扩大本国的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和英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中，实际已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它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的简单手段就可轻而易举地弥补它的国际收支赤字。换句话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取得国际信贷的无穷尽的便利条件。（2）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商品增加价值的分配是大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买主购买它们商品而支付的最后价格中只得到很小一部分，这只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太穷太弱，不能对它们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进行任何有效的控制。（3）发达国家建立的保护性壁垒妨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富国使“自由”国际市场机制越来越不可能发挥作用。在亚当·斯密的经典结构中，自由市场机制的基石是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因此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全世界都是均等的。然而几乎所有富国的移民法却使得非熟练劳工不可能在全世界进行寻求经济机会的大流动。越过国际边界的资本并不多，这既因为穷国的敏感性，也因为富国本身需要。对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还建立起另一道障碍——如富国仅为保护本国农业而发放的农业补贴一项就超过 200 亿美元，为抵制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等简单消费品进口而实行了累进制高额累进制高关税和进口限额。换句话说，富国在它们的生活方式周围树立起了一道保护性壁垒，一面告诉穷国，它们不论在劳力上或商品上都无法与之竞争，一面却大谈其国际市场机制“自由”作用的漂亮话。（4）穷国和富国不平等的讨价还价能力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5）穷国只是在形式上参加了世界的经济决策。^①

^①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 251 页。

本书笔者注意到，距离上述学者的论述又已过去了30余年，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种种不均等和差距依然明显存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国际重要的经济、政治领域的控制或霸权，在许多方面与历史表现如出一辙。针对红极一时的“全球化”浪潮，一位学者指出：

一，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将极为困难。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冲破这方面的阻力，它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陷入停滞，像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无法摆脱经济不发达的地位。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很容易地夺走不发达国家最有利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抢到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回报最高的投资项目，获取巨额利润。中国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三，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一定能使不发达国家真正吸入资金，反而可能导致资金倒流向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际资金流动的方向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①

以上在国际贸易中“不发达国家”的境况分析，在多方面与中国近代被迫开关后的境遇极为类似。如下。

第一，由于贸易双方的国情不同，落后国不具备通过“国际分工”输出输入于己有利的，或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的商品或生产要素。如中国不可能输入因可耕地约束而形成的大量粮食，同样，也不可能输出最丰富的过剩劳力以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由于西方列强是以军事力量和经济优势控制“国际秩序”的，因此形成了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贸易中的资本流、商品流、技术和设备流的流向。如列强运用坚船利炮之武力，在正常贸易无法赢利时，先以鸦片战争强行输入鸦片，后在不平等关税条约下大量输入过剩工业品，等等。结果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从历史上的经常性顺差变为难以逆转的逆差。

第三，后果更为长期和更加严重的是毫无主权的不平等国际贸易极大地破坏了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符合国情的中国经济运行基本规律，从而对中国向“现代转型”造成极大破坏性。

以上三点，后文还将详述。

最近的统计数据说明：“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

^① 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第390~392页。

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 1950 至 2008 年间，世界上只有 28 个经济体——其中只有 12 个非西方经济体——能够以 10 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与此同时，150 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依然是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①

① 林毅夫：《发展经济学 3.0》，联合早报网，2012 年 6 月 20 日。该文还提道：“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主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结构主义模式（structuralism）：目标是把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改变得与高收入国家的相似。一般上，结构主义者会建议政府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 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取得了初期的投资导向型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重复的危机和停滞。接着，对发展的观点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私有化、自由化及稳定化把发达国家已建立起来的理想化市场体系推介到发展中国家，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 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最多也只能说是具争议性，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 20 世纪 80、90 年代描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的数十年”。